

乡村居民休闲的旅游促进效应及对策研究： 以贵州省为例

张红喜，刘琼，张香菊，范莉娜，陈颖¹

摘要：“十二五”“十三五”期间，受“大旅游”战略影响，贵州省在交通条件、经济实力、旅游服务质量及旅游形象方面均有较大改善，已初步形成全省发展旅游的宏大格局。以“大旅游”战略为切入点，立足贵州省乡村居民休闲现状，在此基础上探究贵州省乡村居民休闲的旅游促进效应，并提出针对性建议，进而为贵州省乡村居民休闲业态发展提供理论支持。

关键词：“大旅游”战略；乡村居民休闲；促进效应；贵州省

中图分类号：F592. 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 — 1707(2019)04 — 0066 — 07

引言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贵州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2〕2号）中明确将贵州定位为“文化旅游发展创新区”，这一国家层面的旅游定位标志着贵州大旅游战略的确立和起步。近些年贵州大力发展山地旅游、生态旅游和乡村旅游，乡村交通条件随之得到极大改善，乡村居民收入不断提高，为旅游和休闲业态创造了良好的发展氛围。休闲，尤其是居民日常休闲，事关乡村居民生活质量提升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培育和发展乡村休闲业态是构建和谐乡村社会的一种重要途径。

围绕居民休闲偏好，西方学者从休闲空间建设和休闲动机等视角展开了大量研究。Rodney H 等认为休闲需求、偏好引导着休闲供给，进而推动休闲及旅游空间建设^[1]，Ross K 等诸多学者又分别从休闲消费空间^[2]、休闲设施布局^[3]、休闲空间等级划分^[4]、滨海休闲地建设^[5]等角度做实证研究，指出休闲空间建设错位的问题并尝试解决，为供需导向下的休闲产业发展提供了有益思路。部分学者进一步从休闲动机的视角关注居民休闲偏好，研究发现：居民休闲意愿和动机的产生源于自身、社会及精神层面的需要^{[6][7]}，进一步可将休闲动机细化为逃离、消磨时间、社交、补偿、权力、智力开发、自尊自控及自我实现等

¹**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精准扶贫视域下贵州乡村休闲供给侧结构性优化研究”（17YJCZH240）。

作者简介：张红喜，男，华南理工大学管理学博士研究生，贵州民族大学旅游与航空服务学院讲师；（贵州贵阳 550025）

刘琼，女，贵州民族大学社会学与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张香菊，女，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人文地理学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101）

范莉娜，女，贵州民族大学旅游与航空服务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

陈颖，女，贵州民族大学旅游与航空服务学院本科生。

不同种类^{[8][9]}。

国内关注居民休闲的文献早已有之，如马惠娣、王雅林、楼嘉军、王琪延、郭鲁芳、宋瑞、杨振之等分别从不同视角对居民休闲进行大量研究，然而这些研究多是对都市、城镇休闲的聚焦，对乡村居民休闲状况的关注严重不足，仅有论文 10 余篇。已有的文献中，有学者选取山东、东北、大别山等局部地区进行实证研究，也有学者放眼全国以新农村建设、“三农问题”为背景对农村居民休闲的重要性进行理论诠释和解读，还有学者从微观视角聚焦民间庙会与农民闲暇生活方式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闲暇是一种乡村居民应该享有的福利，城乡差距不仅表现在收入水平上，也表现在闲暇福利的保障上，闲暇福利长期得不到满足必然会影响乡村居民的获得感，进而引起不满，影响“三农”问题的解决^[10]；当前，新农村建设及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是培育新型农民，而培育新型农民的关键是引导乡村居民科学合理地安排休闲，提高休闲质量^[11]；具体到居民的休闲偏好差异上，休闲态度因人而异，受性别、年龄、职业、文化程度等因素影响^[12]；休闲态度及休闲感受上的差异，正是当今乡村居民生活方式分化的一个表征，是农村初步现代化的表征^[13]。在此理论探讨的基础上，孙林叶等提出应通过引导休闲需求、教授休闲技能、培养休闲习惯、提高休闲品味、开发休闲资源、拓宽休闲渠道等途径，帮助乡村居民逐步摆脱休闲困境，享受休闲福利^[14]。综上，已为数不多的乡村居民休闲相关文献对乡村居民休闲的质量、偏好、福利属性等进行了研究。旅游和休闲行为正逐渐同质化，乡村居民的休闲是当前休闲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作为发展战略的旅游产业对居民，尤其是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乡村居民日常休闲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然而相关研究却极其匮乏。因此，摸清贵州乡村休闲业态发展的“家底”，并在此基础上研究贵州旅游开发战略对乡村居民休闲业态发展的影响，极具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贵州省乡村居民休闲业态发展概况

为系统地深度了解贵州省乡村居民休闲的现状 & 影响因素，课题组在完善已有问卷的基础上，采用方便抽样法，安排学校师生利用寒暑假对家庭所在地及其附近的乡村居民休闲状况进行实地调研，调研样本涉及贵州 9 个地州市中 69 个县（区）的百余个贫困乡村（见图 1），回收问卷 1052 份，其中有效问卷 1012 份，有效率 96. 20%，最后通过 SPSS23. 0 软件进行描述性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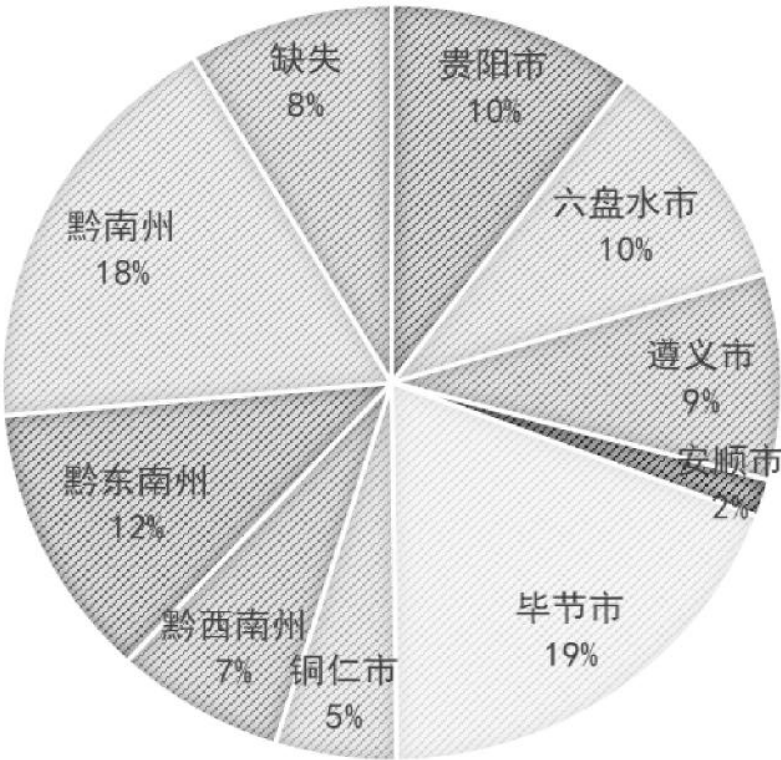


图 1 贵州省乡村居民休闲状况调研样本分布情况

（一）居民对休闲概念认识不足，感知到的可支配时间低于实际拥有

课题组围绕问题“除去工作、家务、睡觉等必要时间花费外，您每天能自由支配的时间有多长”的调研显示：可自由支配时间为“0—2h”、“2—5h”、“5h以上”的受访者分别占38.45%、40.62%、10.23%。受访居民感知到的日均可支配时间远低于我国农村居民2010年的水平（长达5h之多）^[14]，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部分居民对可支配时间及休闲概念的理解存在偏差，认为只有跳广场舞、打太极等放下农活、有目的有意识的参与活动才叫休闲，甚至认为可支配时间就是“什么都不干”，并未意识到看电视、玩手机等许多无意识活动也属休闲和可支配时间的范畴，致使受访者感知到的可支配时间低于自身实际可支配时间。第二，随着农村城镇化工作的推进，农村居民在收入持续增长的同时，工作和劳动时间却在增加，挤压了休闲时间。可见：受休闲认知水平及工作时长增加的影响，受访者感知到的可支配休闲时间与自身实际可支配时间之间存在出入。

（二）可支配收入相对较低影响了平衡性休闲，但对核心性休闲影响不大

中国统计年鉴（2013—2016）数据显示：贵州农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近几年保持逐年增长，但是其与西部和全国的平均水平仍有较大差距。然而，作为国民休闲重要条件的可支配收入，对核心性休闲的影响却相对较弱。Geoffrey G 等（2014）将休闲活动划分为核心性休闲和平衡性休闲^[15]，其中核心性休闲是指常规的、一般在乡村或社区附近举行、可以日常参与且成本较低的休闲活动，如锻炼、散步、广场舞等，平衡性休闲则需要精心准备和策划，需要支付较高成本并从中获得独特经历，如外出旅游等。由定义可知核心性休闲所要求的成本较低，它更加依赖于日常休闲设施和场地等公共供给，而不是较高的居民可支配收入，故核心性休闲完全可以在可支配收入较低的状况下实现。核心性休闲与居民的日常生活质量紧密相关，面对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较低的现状，增加核心性休闲机会，能够有效改善当地居民的生活品质。

（三）休闲动机符合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基本休闲需要占主导

围绕问题“您休闲的动机（多项选择）”的调研显示：动机占比排序依次是“锻炼和放松身心（77.5%）”，“愉悦精神（51.2%）”，“结交好友，增进感情（46.7%）”，“消磨时间（34.7%）”，“更好的工作和生活（25.3%）”，“其他（2.2%）”。根据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按照动机可将休闲需要划分为三大类，需要层级由低到高依次为：基本休闲需要、社会发展型休闲需要和自我实现型休闲需要，根据本研究的统计数据，“锻炼和放松身心”可归入基本休闲需求，“结交好友，增进感情”可归入社会发展型休闲需求，而“愉悦精神”，“消磨时间”可以分别归入三类休闲需求，根据个人情况，三类所占比重会有所差别，综上：受访者的休闲需要符合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的规律，随着需要层级由低到高，基本休闲需要占据比例最大，社会发展型休闲需要次之，自我实现型休闲需要比例相对最少，呈金字塔结构。

（四）政府主导下的休闲供给与村民的通俗休闲需要匹配不足，供需之间有待精准衔接

参考韩鹏云对乡村公共文化的分类^[16]，根据实践样态可将休闲文化内容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外生型的休闲文化内容，它以政府为主体，自上而下进行供给，强调“文化下乡”背景下的国家在场；另一类是内生型的休闲文化内容，它以村落或社区为主体，自下而上的自组织提供，强调地方性文化体系的村落在场。调研显示：与政府通过文化下乡等形式自上而下供给的送戏、送影、送科普、写春联等活动相比，乡村居民更加偏爱“通俗易懂、平易近人、老少皆宜、兼具地域特色”的休闲节目（见图2）。究其原因：第一，大部分“文化下乡”活动具有即时性，居民对其的体认多停留在感官层面，体验和互动不够，也就无法根植于百姓的日常休闲生活中；第二，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诉求及参与积极休闲的意识均有所提高，长久以来一直缺失的村落文化主体意识初步觉醒，开始有意识地表达在休闲内容上的话语权，而不是被动接受已有的文化项目；第三，政府主导下的文化基础设施建设，遵循的是标准化、规范化、高规格的城市化理念，这与村寨内生的具有乡土性、

综合性、情感性的休闲文化之间存在本质上的差别，由于缺乏有效沟通和交流，因此供给和需求也就难以实现精准对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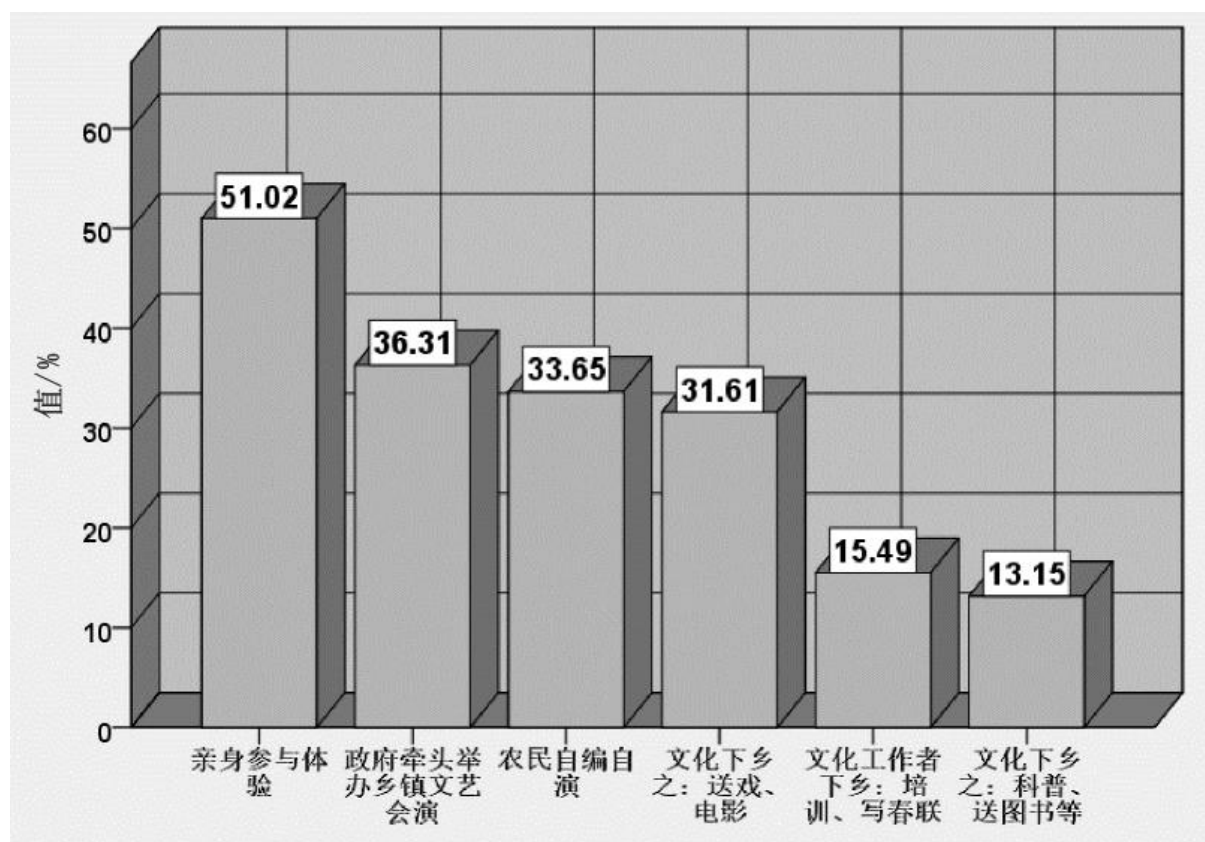


图 2 贵州省乡村居民更偏爱的文化体育休闲活动

二、“大旅游”战略影响贵州乡村休闲格局

借鉴国内外学者的已有研究，大旅游是由旅游业和其他相关产业共同构成的综合性产业体系，是一种新的旅游发展理念和战略，它对旅游产业的地位、市场规模、发展格局、产业链、功能效益均有较高的要求，更强调旅游产业的广泛性、全面性和系统性，是旅游产业进入成熟阶段的重要模式，具有大产业、大市场、大格局、大功能四大特征。贵州“大旅游”战略对于以资源型传统产业为主的生态脆弱的贵州地区实现旅游资源对其它资源替代，旅游产业与传统产业大融合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大旅游”战略对贵州休闲格局的影响，本文侧重在“大旅游”战略下乡村休闲相关产业的发展、旅游开发刺激乡村休闲市场、凸显民族休闲文化等方面进行研究分析。

（一）“大旅游”战略下休闲相关产业应势而动

传统农业向休闲农业转型：休闲农业融合第一、二、三产业，改变了传统的生产格局，不仅能够提升农产品附加值、增加农民收益，还有助于调整乡村农业产业结构，促进乡村农业可持续发展。乡村休闲体育发展进程加快：受“大旅游”战略影响，受访地区，40.8%的政府不断加大体育基础设施建设，并在重大节日活动中组织群众参与体育比赛。30.9%的当地居民也自发组织和参与体育活动，如苗族斗牛、兴仁布依拳等。在此基础上一些休闲体育企业也趋势进入乡村发展。

乡村休闲娱乐业逐步发展：调研显示：2.2%的乡村地区已经有KTV、酒吧、茶室网吧，7.0%的乡村地区出现书店、图

书馆，3. 3% 的乡村地区出现游乐园、电影院、游泳馆等休闲娱乐业。

(二) “大旅游”战略激活乡村休闲市场

受地理、交通、经济等条件的制约，贵州乡村居民消费水平偏低，对休闲消费和投资认识不足。受“大旅游”战略影响，如今贵州乡村地区交通条件有所改善，居民收入不断增加，休闲意识逐渐提高，越来越多的乡村居民愿意对休闲进行投资，休闲消费水平有所提高，乡村休闲市场正不断被激活。

(三) “大旅游”战略促进乡村民族休闲文化的弘扬与传播

受全球化、现代化和城镇化的冲击，原本丰富多彩、历史悠久的贵州民族休闲文化正逐渐走向衰亡。然而，“大旅游”战略下的乡村旅游开发使得民族休闲文化的重要价值被重新认识，当地政府、居民重拾休闲文化自信。访谈过程中发现：当地政府非常重视对传统文化进行保护与开发，正逐步加大对民族传统工艺的保护传承、增加民族休闲文化财政支出，鼓励乡村休闲文化传承人回乡创业，提高乡村居民保护休闲文化意识，并致力于通过影视、旅游等途径扩大民族休闲文化传播。

三、“大旅游”战略改变贵州省乡村居民休闲的要素

(一) 旅游开发提升乡村居民的休闲认同度

利用李克特量表调研乡村居民的休闲态度，从 1 到 5 对应“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比较均值可知休闲态度受到旅游开发程度的影响：在旅游开发积极主动的受访地区，居民对休闲有益的认同度更高，高度认同“人人需要休闲、利于社交、有益身心，能增强快乐感和自豪感”，均值均在 3.94 以上；“闲暇意识：假日和平时没区别”的均值从高到低排序则是“暂时无任何开发（3.27）”、“主动开发但收益差（3.19）”、“被动开发消极参与（3.16）”、“主动开发且收益好（3.08）”。结合访谈可知：旅游开发对居民的休闲态度有正向影响，而且，随着旅游开发的深入，居民在收益增长的同时也认识到旅游的假日效应和忙闲之分。（如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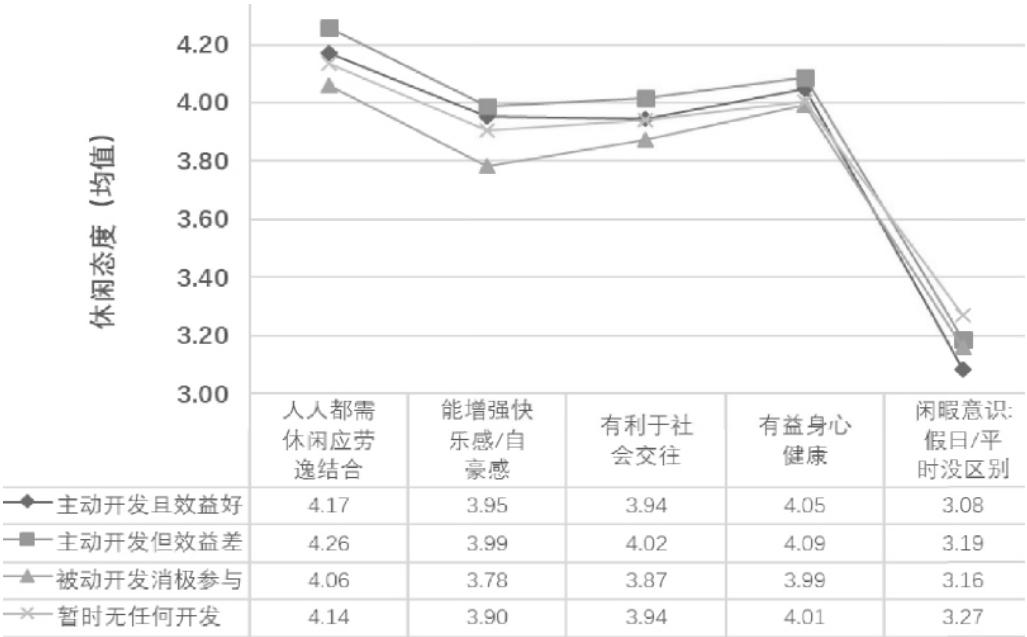


图3 不同旅游开发情景下的休闲态度对比

（二）旅游开发通过影响可支配收入进而影响居民的休闲价值诉求

整体而言，关注价格和娱乐性、舒适性的受访者比例最高，关注安全、卫生、时间和交通的受访者次之，关注休闲的私密性氛围的受访者比例则极低（均低于3.8%）；基本呈现出：旅游业发展越成熟，居民对休闲活动的价格越不敏感，而对休闲过程中的安全、卫生、娱乐性与舒适性的要求则越来越高，在这一过程中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发挥着一定程度的调节作用，基本符合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与上述总体趋势不一致的是：在主动参与旅游开发但收益不佳的受访地区，受访者对休闲正向效应的认可度最高（见图4），愿意积极参与休闲，但受收益不足的影响，表现出高关注价格、低关注安全、卫生，对时间、交通和私密性的关注度也多低于其他地区的受访者。可见：旅游开发通过影响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进而影响居民的休闲诉求，与已有研究的结果基本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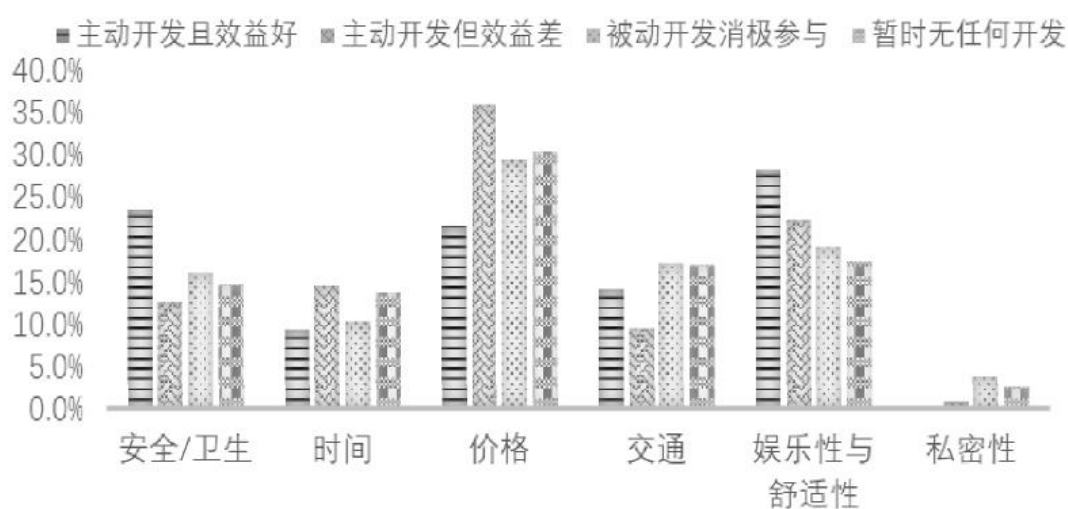


图4 休闲活动中最关注的因素

（三）受消费价格指数和可支配收入水平的影响，旅游开发使休闲消费比重增加

“大旅游”战略下，贵州省乡村旅游蓬勃发展，而居民的休闲消费支出水平与当地的旅游产业成熟度有关。图5显示：从主动开发且收益好、主动开发但收益差到被动开发消极参与，再到暂无任何旅游开发，认为“休闲消费比重增加，休闲花费更多”的受访者比例逐渐降低。结合访谈可知，受消费价格指数和可支配收入水平的叠加影响，旅游开发程度越高，居民所在地的休闲成本越高，同时居民的休闲支付能力也越强，致使更多受访者感知到“休闲消费比重增加，休闲花费更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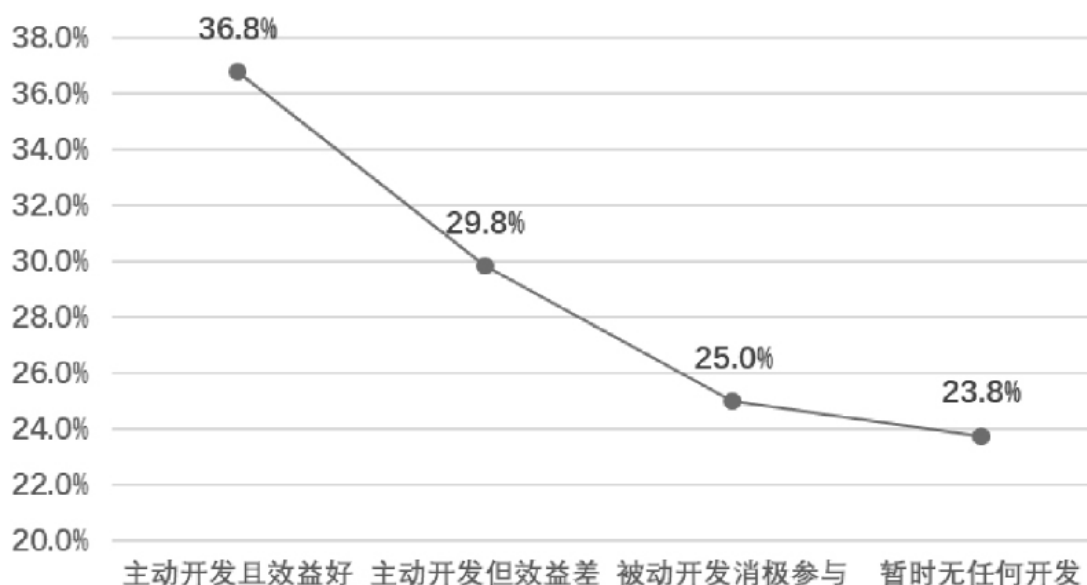


图 5 认为“休闲消费比重增加，休闲花费更多”的受访者比例

（四）经济发展水平和城乡二元休闲布局，影响乡村居民多元休闲需求的实现

旅游开发程度对居民休闲项目诉求的影响不够显著。尽管旅游开发程度不同，但受访者“渴望参与但却从未参与过的休闲项目”却差别不大；技能型休闲最被各地区受访者期待，剧院演出类、美容健美类、博物馆参观类、专业健身和舞蹈类等也不程度地被受访者青睐，只是在占比排序上略有差异。结合访谈数据反映出以下休闲活动现状和诉求：第一，受访者的休闲参与需求受到经济发展水平和城乡二元休闲布局的限制，攀岩、滑雪、骑马、高尔夫等技能型休闲以及话剧、专业健身等消费型休闲虽然已经进入受访者的视野且有较高的体验需求，但却无法得到满足；第二，随着乡村振兴战略和扶贫脱贫工作的推进，贵州乡村居民的整体素质已有较大提升，受访者不仅渴望通过美容健美、专业健身来提升外在美，还渴望通过话剧歌剧欣赏、博物馆参观等休闲活动来提升内在品味；第三，日常休闲设施布局不足，休闲内容仍较为单一，露营、烧烤、垂钓、游泳等休闲活动仍有一定比例的受访者“渴望参与但却从未参与过”。

四、贵州省“大旅游”战略背景下乡村居民休闲业态发展对策

“十二五”、“十三五”期间，“大旅游”是贵州旅游发展始终坚持的战略，在此背景下贵州乡村休闲业态逐步得到发展，然而就目前发展现状来看，在不同旅游发展阶段的各乡村地区，休闲业态的发展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乡村居民的休闲感知和休闲认知也有所不同，今后贵州乡村休闲业态的发展应因地制宜、有的放矢。

（一）加强政府重视程度，制定乡村休闲业态发展规划

贵州省乡村居民休闲水平的提高是贵州省乡村居民生活水平改善，步入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体现。当地政府应加强对居民休闲的关注和重视程度，明确乡村休闲业态发展的作用和地位。制定切实可行的休闲业态发展规划。贵州省乡村休闲业态发展，起步较晚、基础薄弱、发展不成熟、市场生态经济发展不协调，需要当地政府大力支持，无论是在政策上、资金上、扶持力度上，均需要结合自身实际做好统筹安排。

（二）加快乡村居民休闲业态融合发展

贵州省乡村居民休闲业态的发展，不能是孤立片面地发展，只有强化休闲业态与相关产业的融合发展，才能形成休闲产业链和休闲产业群。基于此，在当前健康中国战略指导下，通过“旅游+”、“休闲+”战略的实施，逐步实现乡村休闲业态与旅游、健康、养老、体育、娱乐等产业的融合，不断促进休闲文化的传播与融合，如乡村休闲与地方民俗节庆节日的融合。

（三）加强休闲专业人才培养建设

访谈发现，贵州省乡村居民对于技能型休闲活动的参与力度较低，究其原因，在技能型休闲上，居民缺乏专业的理论和技术指导，相关休闲企业的管理服务水平不高。针对目前乡村休闲企业服务人员水平有限、服务理念落后、管理不科学、经营理念落后的问题，应该加强服务人员的培训，引进专业休闲人才，提高乡村休闲人才队伍的素质，提高乡村居民的休闲积极性，进而为休闲业态发展提供市场。

（四）提高乡村居民休闲意识，引导乡村居民健康休闲

贵州省乡村居民休闲业态的发展，离不开乡村居民休闲意识的提高。调研发现，贵州省乡村居民大多对休闲不了解或知之甚少，目前参与其中的休闲活动多数是消极的，如赌博、酗酒等。因此，要发展乡村居民休闲业态就必须改变现状。具体有几个方面：加强休闲教育，通过乡村文化墙，报纸、村委会宣传等方式增加人们对休闲的认识；提高乡村居民收入水平，刺激休闲消费能力；积极引导居民参与积极健康的休闲活动，消极休闲活动不仅不利于身心健康，还可能破坏当地社会休闲氛围，不利于当地休闲业态发展。

（五）加强公共休闲设施建设

统计显示，贵州省乡村居民休闲设施数量较少且维护保养不足，休闲方式和休闲内容单一且受现代化城市休闲文化的冲击较大，缺乏本土精品休闲文化产品和类目，休闲娱乐场所布局不充分、不均衡。受基本休闲条件的限制，当前贵州省乡村居民休闲质量和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考虑到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及休闲所需的基本条件等因素，当前应对居民休闲影响较大的活动广场、休闲绿道、休闲活动中心人手等逐步改善，同时，逐步改善制约休闲发展的交通条件和休闲设施。

（六）因地制宜，实施跨越式休闲发展战略

休闲事关人性的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事关人民美好生活获得感的提升，保障经济欠发达地区居民的休闲权力、休闲机会和休闲话语权，将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举措之一。核心性休闲完全可以在可支配收入较低的状况下实现，面对不平衡不充分的休闲发展状况，应当优先保障全民核心性休闲需要的满足，使其在经济发展不充分的情况下提前享有休闲福利，最终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

参考文献：

[1] Matsuoka R H, Kaplan R. People needs in the urban landscape: Analysis of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contributions [J].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08, (1) .

[2] Ross K Dowling. Tourism and recreation [J]. Tourism Management, 2003, (5) .

[3] Cathal O' Mahony, Gault J, Cummins V, et al. Assessment of recreation activity and its application to integrated management and spatial planning for Cork Harbour, Ireland [J]. Marine Policy, 2009, (6) .

-
- [4] Joyce K, Sutton S. A method for automatic generation of the Recreation Opportunity Spectrum in New Zealand [J]. Applied Geography, 2009, (3) .
- [5] Preston —Whyte R. CONSTRUCTED LEISURE SPACE The Seaside at Durban [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01, (3) .
- [6] Ewert A. Differences in the level of motive importance based on trip outcome, experience level and group [J]. Journal of Leisure Research, 1993, (4) .
- [7] Bergin D A. Leisure Activity, Motivation,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in High School Students [J]. Journal of Leisure Research, 1992, (3) .
- [8] Tinsley H E A, Kass R A. The Latent Structure of the Need Satisfying Properties of Leisure Activities [J]. Journal of Leisure Research, 1979, (4) .
- [9] Schulz J, Watkins M.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eisure Meanings Inventory [J]. Journal of Leisure Research, 2007, (3) .
- [10] 郭景萍. 我国农民闲暇福利现状与合理化构建 [J]. 求实, 2005, (5) .
- [11] 陈桂香. 农民闲暇消费论——兼论新型农民的培育 [J]. 农村经济, 2008, (5) .
- [12] 金海水. 东北地区农民休闲态度实证研究 [J]. 商业时代, 2010, (12) .
- [13] 谷中原, 余成普. 山区农民闲暇生活方式的实证研究——以大别山区一行政村为例 [J].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 (1) .
- [14] 孙林叶. 我国农村居民休闲的现状与对策 [J]. 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2)
- [15] Geoffrey Godbey, 李金妹. 中国的休闲改革漫谈 [J]. 湖北理工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4, (1) .
- [16] 韩鹏云. 乡村公共文化的实践逻辑及其治理 [J].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2018, (3) .